

文学评论家丛书

演进与代价

秦晋著

WEN XUE PING
LUNJIA CONG SHU

陈荒煤、冯牧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06.7/297

文学评论家丛书

演进与代价

陈荒煤、冯牧主编

秦 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S3065/03

0

1512773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演进与代价/秦晋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7

(文学评论家丛书)

ISBN 7-02-002063-1

I. 演… II. 秦… III. 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3849号

责任编辑:杜丽莉 王培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82,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25 插页3

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定价9.80元

作者简介

秦晋，祖籍山西孝义，1939年2月生于陕北安塞。1960年毕业于北京第四中学。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之后赴德国莱比锡赫尔德学院学习。“文革”期间在武汉钢铁公司当工人。1973年到光明日报社工作至今。现任该报文艺部常务副主任。



作 者 像

《文学评论家丛书》总序

陈荒煤 冯 牧

收在这部丛书里的，是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一些中、老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论文结集。他们为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付出了自己一份心血与努力，如今得以丛书的形式出版，这在当前商品大潮冲击下，出版严肃书籍相当困难的今天，实属不易。为此，我们感到分外的欣慰。

凡是稍稍对多年来文学发展的风雨历程有过历史的了解和怀任何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的文学事业，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当代文学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总结了深重曲折的历史教训，以拨乱反正的巨大魄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果断地调整了一系列文艺方针与政策，认真切实地贯彻了“二为”与“双百”方针，使一度万马齐喑、百卉凋零的文艺局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学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得到了复苏的生气与巨大的活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或许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文学的许多领域，出现了方兴未艾、令人欣喜的复兴。

文学创作开始以严肃、真诚和力求深刻的态度，重新真实地切入和审视历史与社会的深层次变化，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反思精神，深入而广泛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惊涛骇浪般的波澜、错综复杂的尖锐冲突，以及由于激荡的社会变动而形成的种种悲喜忧欢的人世沧桑。许多作者以自己切身的感受为经，以

凝重深刻的思考为纬,或深沉,或生动,或庄严,或幽默,或颂扬,或鞭挞,把生活在不同层次中的不同人物的复杂生存状态与隐秘心理活动,用多彩多姿的笔墨,历历如绘、不加讳饰、画卷般地呈现于读者眼前,撼人心魄,扣人心弦。作者对自己笔下人物的美丑心灵与悲喜命运的揭示,获得了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社会效应。

人们把新时期文学这样萌动勃发的格局与气象,称之为文学的“喷涌现象”和“轰动效应”,应该说不失为一种颇具代表性和说明性的概括。新时期的文学事业对彻底否定“文革”,促进改革开放,的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回顾新时期以来日益兴旺的文学现象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在促成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理论批评工作者曾做过正本清源、总结教训、冲破禁区、开拓新途的大量艰苦工作。如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曾有过相当严重的“左”的失误。诸如脱离实际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工具论”、“阶级斗争晴雨表”等等提法,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脱离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庸俗社会学、形而上学、“无冲突论”等等清规戒律,与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都曾弥漫于一时。正常的理论批评探讨,被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上纲上线、横加指责所取代。甚至对日常生活与婚姻爱情的描写,也被极其简单化地加以指责,轻则斥为“情调不健康”、“散布人性论”,重则批为“立场问题”、“政治问题”。这类不问青红皂白、专横武断的“批判”与“罪名”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许多作者不仅惶恐不安,无所措手足,甚至束手搁笔。到“四人帮”横行时期,文艺事业更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文艺工作者几乎在劫难逃,极少幸免。“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极左方针与封建法西斯式的文化箝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搞出了一整套貌似极

左,实则是破坏文艺规律的条条框框,力图迫使文艺为他们的阴谋政治服务,终于使整个文艺事业濒于绝境,大批文艺工作者所遭到的种种迫害与苦难,更是罄竹难书,一言难尽。

粉碎“四人帮”之后,历史发展出现了巨大转机。特别是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的祝词高度评价文艺工作者对“四人帮”的抵制和斗争,对今后文艺工作提出了很高的期望和要求。于是“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文学开始了新的复苏。然而由于“左”的思潮的长期影响,虽然整个局面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文学上许许多多清规戒律与大大小小禁区,却依然沉重地压在文学工作者心头,令人心有余悸。这就严重地束缚了文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阻遏了文艺事业的活力与生机。在这样的时刻,如何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正本清源,廓清种种严重违背文艺规律的极左思潮,冲破重重人为制造的大小禁区,就成为推动文学发展不可缺少、势在必行的重大步骤。收集在这套丛书里的评论,正是一些评论家们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这个时期从文学思潮、文学理论与创作评析等等方面,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和探讨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力求把长期颠倒了的是非黑白重新颠倒过来,还文学艺术规律以本来的面目,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关注着新时期文学的不断发展,并为文学继续开拓新途,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理论批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多方面的剖析与总结,澄清并理顺被极左思潮所搞乱了的理论观点。二、以严肃认真的理论勇气,冲破在“左”的思潮支配下,以庸俗社会学、形而上学为僵死框架制造的种种文学禁区,使作家继续从令人窒息的禁锢与压力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对于自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众

消费文化”的泛滥而出现的不利于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事业的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进行必要的批评与廓清。三、热情地支持并肯定勇于直面人生,真实揭示社会矛盾,大胆追求真理的新创作、新思想。四、综合观察、追踪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嬗变演进,探讨不同阶段创作的利弊得失,以阐述新时期文学的新趋向。五、积极扶植、鼓励脱颖而出的文坛新秀,以及富有艺术品格、艺术个性的新探索,积极支持文学事业持续开展的新机遇。

以上粗略的勾画,是这套评论丛书几个主要的方面,但是由此也大体上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正是在弃旧图新的历程中,以具有时代新意的创作与理论,构成了两只互为辅佐依傍的有力车轮,不断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昌盛和发展。

这些评论家活跃于文坛多年,年龄都已在中年以上,他们的理论特色和他们所经历过的时代风浪与自身的忧患意识紧密相关。因此在他们文论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为人生、为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烈入世精神,他们的文字,或许可以称之为文艺社会学批评。即侧重于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论述与评点。他们在探究文学现象的来龙去脉时,往往也采取这样的视角来加以把握,这无疑有它的长处,但也难免有它的局限,比如对于作品的艺术情趣与艺术个性的分析与品味往往不免流于粗疏。另一方面,对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热衷于搬用西方某些观点与模式的现象,也还缺乏深入、具体的剖析。出版这套丛书,并无意于褒贬某种“模式”或“流派”,更非以求定于一尊。正如文学现象本身和社会生活一样丰富、生动、复杂,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不能也不应以单调划一的角度去把握多样的文学形态,而是理所当然地应以多种审美方式与审美角度,从不同层次去研究、探索、理解、评析各种丰富、生动、复杂的文学现象,以期更贴切、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奔流万汇的文学大河,从而求得

某种参透与领悟。不同的理论批评正是以自己具有的特点与长处,而取得各自存在的根据与理由。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互相地吸取、融汇与渗透或许更重于互相拒绝、排斥与否定。建立与维护正常的争鸣与辩诘的良好氛围,更无疑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以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无论就历史意义还是就现实意义而言,都有它的价值。至于文学本身,或高华,或沉实,所谓“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各极其则。”文学理论亦复如此,也只能各抒己见,力求在平等的探讨中求得共识,却不可囿于固有的偏见或成见,恣意武断地判定是非曲直。

当前,全国都在热情地学习《邓小平文选》,力求更深刻地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更有责任进一步认识和贯彻小平同志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更全面、更深入地贯彻“二为”和“双百”方针,共同为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套丛书,格于经济方面的诸多困难,未能编入近年来卓有成绩的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文集,使我们深以为憾,这只有俟诸他日,再求弥补了。

序

冯立三

作为中年评论家的功力、特点、作用和影响的一种有力的显示，秦晋文学评论集《演进与代价》的出版，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嘱我作序，我深感荣幸。

中年评论家在中国评论界占据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地位。他们充分肯定并由衷尊重老一代评论家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革命文学传统的漫长的奋斗中所建立的历史性功勋，他们充分肯定并由衷尊重老一代评论家以拨乱反正的巨大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为新时期文学的健康发展所作出的奠基性成就。他们充分理解并尽力保护青年评论家广泛吸收当代西方一切新鲜、有益的观念、知识以构建中国新的批评模式，探索新的批评语言，显示新的批评锋芒的生气勃勃的努力。他们作为老一代评论家与新一代评论家之间相互沟通的媒介与桥梁，使双方获益，使既是多元的，又是具有共同的时代的和民族的文化质地的中国当代批评建设成为可能。他们面对急速变化的时代和作为这个时代的重要内容、重要特征的新一轮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文化态势，审时度势，以综合为其追求，以中和为其自律，寻找并确定自己的历史方位，既不丢弃传统，又不薄待新潮。中年评论家的批评的本质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与美学的理论体系，杂糅部分则是为这一体系所能容纳并为发展这一体系所需要的一切新知旧说。中年评论家所持的这种尊重传统然而

有所扬弃,追随潮流然而决不盲从的立场,应该得到理解,也确实得到了相当的理解。但以己律人之论,不时而出,两方夹击之苦,多所领教。保守者以缺乏坚定性斥之,激进者以锈迹斑斑相刺。都有脱离现实存在之嫌。时代变化了,生活变化了,人心变化了,文学艺术岂能不随之而变化?拒绝变化,依然固我,文学艺术,理论批评,岂不成了遗老遗少?西方现代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形态,虽然驳杂混乱,毕竟有我们所不及的优胜之处,是应该借鉴与学习的,我们的先人不是早就讲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吗?但学习和借鉴必须基于建设独立的中国文学之需要,适用者拿来,不适应者不取,是学习、借鉴的本义。王蒙、李国文等大家,在当代中国新时期文学创造中是最早采取意识流手法的,但不独其社会环境、人物心理是道地的中国货色,就是意识流的描写本身,也不似某些西方意识流作品那样的自然主义的琐碎、平庸,而是始终贯穿着典型化原则。这才能为广大的中国读者所理解,所欣赏,也才能使西方同行从中受到启迪。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亦步亦趋,照猫画虎,中国文学想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那就只是一厢情愿了。文学评论亦如是。系统论、控制论、结构主义、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生物学、边缘科学、语言符号学、原型分析,都可涉猎,以使文学批评能从更多的角度,能以更深密的分析,切合并把握对象。对于角度、观念、语言单一化、刻板化的批评,作家们早就大为不满了,谁会满意自己思接千载,神游八荒,呕心沥血,字斟句酌创造出来的血肉丰盈的、有机的、无论从整体抑或从局部看都是美的、极具个性化的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被批评家批评、归结为几根粗糙的思想支柱和白厉厉的一副骨架呢?没有任何一个批评家愿意把文章写成这个样子,但观念陈旧、知识贫乏,想改变也无从做起。在贯通马克思主义批评、俄国十九世纪批评、中国传统

批评、当代西方批评并凝结为自己有创见有个性的批评方面，中年评论家中做出艰苦努力的大有人在，因为我们这里谈的是迄今为止的整个新时期的中年评论家，且把“中年”界定为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所以目前仍处于中年时期且异常活跃的评论家，与今已步入老年但其中年时期有相当长一段与新时期重合并有重要成绩的评论家，都一概列为中年评论家。在这一时期做出不同程度的成绩的中年评论家估计有几百名之多，其著名者有：唐达成、唐因、谢昌余、苏中、鲍昌、蓝翎、江晓天、顾骧、谢冕、陈丹晨、谢永旺、阎纲、晓雪、孙绍振、王先霈、李子云、李国涛、刘建军、刘锡诚、张炯、王愚、潘旭澜、范伯群、徐俊西、畅广元、严家炎、宋遂良、李元洛、缪俊杰、陆贵山、吴泰昌、贺兴安、何西来、张同吾、滕云、杜书瀛、陈骏涛、张韧、蔡葵、秦晋、冯立三、陈美兰、刘思谦、盛英、吴宗蕙、黄毓璜、童庆炳、何镇邦、周介人、韩瑞亭、鲁枢元、雷达、谢望新、李炳银、曾镇南、李星等。而秦晋，在这批人中，也要属于相当用功、成绩突出的一位。我在这里看重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秦晋的文学评论写作伴随着迄今为止的整个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他的许多文章曾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有的还得过奖。他多年来主持《光明日报》文艺部的工作，组织、参加过无数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的研讨活动，常有过人之见，却从不夺席谈经，相识者有口皆碑。

我与秦晋曾在北京四中文科班同窗两年。本来，他是高干子弟，我是平民之后，不愿过多接触。当时我想入团，团支部派他做我的入团联系人，我于是按期向他汇报思想，这才接近起来。我很快发现他对听取我的思想汇报兴趣不大，常常不置可否，不过是例行公事。于是我们就谈《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个人的遭遇》、《阿尔达曼诺夫一家的事业》、《沉船》、《姆采里》、《上尉的女儿》、《野草》、《战争与和平》……双方都兴高采烈。当时

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黄庆发先生，他鼓励我们读书，学校批判“白专道路”，他也不改口，还说，不读书的人就是白痴。

有一天，我的脸盆里那条已有两个大窟窿非要造成三折才能使用的旧毛巾为一条带有绿色方格的新毛巾所取代，早已空空如也的肥皂盒里也被一块溢散芳香的乳白色香皂所填充。我估计这是秦晋所为，问他，他说，你管是谁给的呢，人家不声不响放在那里，意思就是让你别问，一问，就辜负人家的好意了。我很感动。我当时是靠乙等助学金上学的穷学生，每月八元的助学金只够交伙食费，球衣、球鞋、背心、短裤，穿的是学校运动队的，其他花费，除了暑假做小工所挣，便是同学和老师赞助了。春游八达岭的车钱是谁代交的，钢笔是谁送的，电影票是谁买的，我都忘记了，但这条毛巾和这块香皂，却记忆犹新——直到高中毕业，这条毛巾都没有用坏，这块香皂都没有用完。大约是高三上学期，天降小雨的一日，秦晋请我到他家去玩。那是一个刚刚翻新了的四合院，高屋回廊，花木石阶，与我家所居之大杂院有天壤之别。秦晋把我迎进他住的西屋，他的母亲便过来看我，她的年龄不会小于我的母亲，但显得年轻多了。随后请我到东屋吃饭，安排我坐在秦晋的父亲秦力生旁边。菜很丰盛，似有准备。秦力生不大说话，几次给我夹菜，嘱我随便一点。去年参加秦力生遗体告别仪式时我也落泪了，我想那缘故，该是因为这位老干部平生无违心之论的节操令人景仰，另一方面就是忽然忆及他给我频频夹菜那件往事。

四中毕业后，秦晋考上北大中文系，我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我知道原因所在，虽觉屈辱但不敢有所流露。秦晋安慰我，上哪个大学不一样！北大不一定是人才，师院也不见得不出人才。我的讲义到时给你看，不跟念北大一样吗？后来，我真的有几次去北大看他的讲义，油印的，可惜都是有关古籍整理的学

问，索然无味，远不如师院王景山老师、王蒙老师的现代文学史课之令人兴致盎然。

大学毕业后，秦晋去东德留学，我分到中学教书，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遭劫难，人在另册，难与故人互通音问，竟至与秦晋一别十五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幸得重逢。那时他已是光明日报文艺部的副主任，我则在家中攻读外语准备考研究生。相叙别情，我才知道他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便被赶出我曾做客的颁赏胡同那座四合院，落脚在西单西斜街五十三号一所大杂院与普通市民为邻。他感念这些寒微的街坊对他这个落难的家庭的关照，他说，今后我一定要写一篇长长的散文，题目就叫《西斜街五十三号》。还说了一句类似李国文在《冬天里的春天》中说过的“春天始终在人民心中”那样富于哲理的话。秦力生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际属于“在劫难逃”，但秦晋本人因既做留学生又兼政治辅导员而被当作“走资派”批判，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随后他去了武钢。是发配、改造还是锻炼、休养，我忘记当时他是怎么说的了，但他对武钢工人正直、坚毅的满口称赞，言犹在耳。秦晋在品尝了高干子弟、官派留学生的优越感之后，亲身体验一下极左政治的残酷与荒诞，黎民百姓的生活和愿望，善良的心和朴素的美，是大有好处的！没有这番体验，或者不会妨碍他成为评论家，但那思考方向与感情色彩，将注定与今日的有别，正如颁赏之四合院与西斜街的大杂院有别一样。

他劝我不要考研究生了，直接到报社当编辑算了，工作调动由他来办。那时我已在《光明日报》发表过几篇文章，也去过报社几次，对温文尔雅的文艺部印象甚好。那就试试看吧。果然艰难。当初整我很凶，此刻殷勤挽留，让人惆怅感叹。耗费了一年精力，疏通了无数关节，才告别了那所留下了我的爱情、友情、师生之情也留下了我的痛苦、悲愤、屈辱的中学。听说后来出让

了一半操场换盖大楼了，当年斗争胡耀邦我做陪斗的那个台子，大概已经荡然无存了吧？

秦晋把我引进光明日报，直到1989年初我调《小说选刊》，整整九年，我与秦晋朝夕相处，感情日益深厚自不待言。有谢公望、许兆焕、秦晋为我担责，有盛祖宏、章正续、黎丁代我谋划，有单三娅、韩小蕙、王东辉、沈卫星、曹继军与我同心，我如沐春风，获益非浅，我将永远怀念我在光明日报度过的九年岁月。上班后我与秦晋各自公干，下班后常聚一起谈文说史，切磋文章，有时心血来潮，索性留下不走，挑灯夜战，可谓无酒也可论英雄，兄弟合作著文章。秦晋出力多的，他署名在前，我出力多的，我署名在前。秦晋见多识广，我是沾了他的光的。秦晋的文章，视野开阔，思想深刻，逻辑严谨，语言凝炼，引证名人恰到好处，我常常是先睹为快。

我最早看到的秦晋的文章，是1979年1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读〈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题目取自苏东坡的语言，用于概括陶斯亮怀念其父陶铸的散文真是恰当极了。斯亮这篇散文，当时我就看过，一反过去散文的矫饰之态，一任思绪奔流，一片呜咽之声，令我潸然泪下。与之相应，秦晋的文章也写得情词激越，文采飞扬，风雷激荡，杜鹃啼血。一篇散文，一篇评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请看秦晋的评述：

此刻，郁积在陶斯亮心底十一年的悲愤与冤屈，终于一齐迸发了出来，犹如滚动着的熔岩，奔突而出，带着震耳的巨响，闪烁着耀眼的火光，燃烧着愤激的火焰。它，又像是轻拢漫捻的琴音，弦弦掩映声声思，倾诉着碎心的往事。从她惊惑不安、心酸悲伤地与父亲相逢，到在监禁中观荷花寄

托情操，谈史论诗，聆听囚训，到使她抱憾终生的不告而别，到千里之外荒原祭奠，对苍天发誓……一字一句都浸透着血和泪。真是握拨一弹，心弦立应，悲歌一曲，催人泪下。

在这里，你不能把作家与评论家、形象与抽象、情感与理智、叙述与发挥截然分开，创造与再创造已经契合无间，浑然一体了。既似熔岩奔突，烈火焚烧，又如弦弦掩映，轻拢慢捻，那刚柔相济的风格也便无须直说了。

中国当代散文，十几年来有长足的发展。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当时堪称空谷足音，到秦晋写作《天地人生——评余秋雨、史铁生、雷达的三篇散文》，散文已蔚然而成大国。秦晋指出，这三篇“内容与写法完全不同的作品，却以一种同样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社会文化和人生意蕴的共同思考”。这是一个很新鲜很完整的概括，过去还不曾有过这样的说法，这当然是由于在过去的散文中这种特征尚未充分显现。一旦显现，立即予以捕捉并进而阐述之，这是秦晋的敏锐。

秦晋对雷达感悟足球竞技与人类本性，社会心理，民族感情的紧密联系，将球场角逐与人生搏击“深刻而有意地融于一体”（《足球与人生感悟》），深表赞赏。目前以足球比赛借题发挥的散文日见其多，雷达是始作俑者。秦晋的《足球与文学》有后来居上之势，文中“足球是对手的否定，对足的张扬”一语令人拍案叫绝。有意味也可争论的是雷达、秦晋一唱一和对“斯基拉奇模式”的贬斥。说斯基拉奇“巧于设计，善自为谋”，“不凭其本事，不靠正路子”，我以为言重了。“斯基拉奇站位好，灵敏度高，穿插飘忽，经常得手”，这不就是“真本事”、“正路子”吗？“偃旗息鼓而攻之”，乃上乘战法，正如防守反击，全线退却，诱敌深入，忽然长驱直进，使敌无所措手足，都是绿茵场上激动人心的时